

**编者按**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源泉相应枯竭，特别表现在经济增长动力不再能够单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而必须消除各种制度障碍，转向创新驱动和生产率驱动。同时也要看到，在一定时期内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有通过改革挖掘传统“人口红利”的潜力。

# 对“人口红利”的几点认识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一席谈

本报记者 马志刚

## (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问题，一直是经济界争论比较激烈的焦点问题。特别是这些年，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悄然发生一些变化，经济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一问题更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我国人口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人口红利”真消失了吗？会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常态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战略？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人口与劳动经济领域的权威专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

**记者：**近三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下降，且降幅有明显扩大趋势。国内外对这个变化都很关注。我国人口的真实情况如何？

**蔡昉：**按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到达峰值，为9.4亿。自那之后就出现了负增长，而且总体来说，这个年龄段人口减少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预测到2020年大体上降至9.1亿。也就是说，这期间将净减少3000万。相应地，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70.1%下降到66.0%。如果粗略地看，这个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的趋势，可以被解释为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记者：**这个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总体趋势，在劳动力市场上是怎样具体表现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从哪些具体的就业人群来观察这个变化？

**蔡昉：**首先是看新成长劳动力总量

变化。在统计上，我们可以把各级各类教育阶段的辍学人数、毕业后未升学人数相加，得到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岗位的人口。例如，从初中辍学的以及初中毕业没有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人群，一般来说都成为新成长劳动力。这个新成长劳动力群体，已经在2013年到达峰值，此后以每年大约2%的速度负增长。

新成长劳动力负增长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数量的短缺，还减慢了总体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我国作为一个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都显现超常规跨越的国家，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主要依靠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进入。在改革开放时期分别经历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这样的超常规教育发展的情况下，新成长劳动力以其更高的受教育年限显著改善了劳动力整体的人力资本。然而，随着新成长

劳动力数量变成负增长，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必然要放慢。如果教育没有一个大的发展，每年新增人力资本总量（以新成长劳动力人数乘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迅速减少，2018年以后也将进入负增长轨道。

其次是观察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群体的变化。我们常常也把农民工称为农业转移人口，其实这个人群总体来说不是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中的，而主要是农村完成义务教育之后陆续离开农村，进入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因为目前真正务农的劳动力年龄比较大，转移的意愿和能力都不太强。例如，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全部务农劳动力中，16—19岁所占比重仅为3.1%，20—24岁也仅为8.9%。具有农业户口的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大约为初中毕业到高中毕业后外出务工的年龄，因而可以被看做新成长农民工。这个群体已经于2013年达到峰值，2014年则开始绝对减少。与此相对应，外出农民工的年度增长率，已经从2005—2010年的平均4%显著地下降到2014年的1.3%。

不赞成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论据是今后很长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还会保持足够庞大，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会维持高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增长概念，虽然我们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基准，但仅仅从人口特征的角度进行静态的观察，是无法得出正确判断的。

你想一想，当我们讲经济增长时，其实谈的是一个增量，是存量不断扩大的一个速率，因此，要把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挂起钩来，也必须看人口结构变化的方向和速度。换句话说，不是看有多大规模和多大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而是看这个人群是扩大还是缩小，占比是提高还是降低。当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发生了从扩大到减少，该人口占比从上升到降低的变化时，劳动力供给从扩大变成缩小，人力资本从迅速改善转变为缓慢改善，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从高位走向低位，生产率提高速度明显下降，以致显著地压低了潜在增长率，作出“人口红利”难以继的判断，不仅在理论上是自治的，显然也是符合实际的。

应该说，有人坚持说“人口红利”尚未消失，受到一定的情绪因素影响，即不愿意得出我国经济从此告别高速增长时代的结论。其实这里面存在一点对“人口红利”的误解。对于处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常常会享受到人口年龄保持年轻、抚养比下降带来的有利于增长速度的“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却不是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事实上，在接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人口红利”终将丧失，经济增长动力仍然有所依托，而能否转向这个新的增长动力上来，就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

拉动因素，而你提到的这些社会和产业领域的发展，恰好可以把两者有机结合。

首先，这些领域的发展都是为了使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好和更均等地分享。农民工未来是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最重要来源，其受教育程度不仅关系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从而使就业的稳定和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更重要的是关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迈入中高端。同时，随着就业稳定和收入增长，一旦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转化为同样庞大的消费者群体，我国经济增长需求结构将更加平衡，需求拉动力则更加可持续。

其次，与人口年龄结构和预期寿命提高相关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本身也将带来诸多产业发展和内需扩大的新机遇。例如，老龄产业、养老产业和医疗产业既是民生产业，又是工业化高潮之后服务经济加快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目前和今后的老年人，大多是改革开放时期高速增长的分享者，有一定的收入积累、社会保险覆盖较充分、预期寿命长，因而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他们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扩大消费需求，甚至维系宏观经济均衡和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记者：**从扩大内需方面看有什么新的机遇，如农民工市民化、养老产业、医疗产业等？

**蔡昉：**保持中高速增长既是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也需要更加可持续的需求

## (二)

非农产业，就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叫做全要素生产率，是指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作用之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因素，包括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管理水平提高所导致的效率改善。在我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这种效率来源也就大大萎缩了。

**记者：**上述变化的结果，是不是必然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与这些变化的具体联系是怎样的？

**蔡昉：**经济增长是由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造就的，因此，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逆转性的变化，前面列举的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减速、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减慢，就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减速的原因进行探讨，也依据不同的方法预测未来的增长，结论不尽相同、观点莫衷一是。例如，林毅夫教授依据“趋同”假说，根据一些亚洲经济体的经验，认为我国今后仍然可以有8%的增长潜力。而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教授则依据“回归到均值”经验，预测我国经济增长率将降到5%甚至更低。但是，这些预测没有具体考虑和分析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潜力。如果从上述因素出发，借助“潜在增长

率”这个概念，有利于更客观地作出增长预测，同时有助于我们找出应对策略，以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发展。

潜在增长率是在特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供给以及生产率提高速度约束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速度。所谓“正常”，是指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和周期性失业。从上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变化看，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必然的现象，而伴随潜在增长率下降出现的实际增长率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的转变，不是暂时的周期性现象，而是新的发展阶段的特征。

我们具体测算结果是，正是由于上述增长源泉的减弱，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以前接近10%，下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6%，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将进一步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6.2%。应该说，迄今为止实际增长率的下降趋势，与我们预测的潜在增长率变化基本吻合。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一些改革红利将显现出来，很有可能会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延缓增长速度下行的惯性。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是判断一国“人口红利”的依据。我国的“人口红利”真的消失了吗？

**蔡昉：**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化指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变化趋势才是“人口红利”的判断依据。有的研究者

化，城镇劳动力供给则可以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延长劳动力转移过程，还可以使经济增长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实施生产率驱动战略提供源头之水。

其次，长期看，通过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提高我国人口生育率，一方面可以推迟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十几年之后适度增加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例如，有的研究者估算，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每提高0.1，如从目前的1.4提高到1.5，当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75年前后达到最高点时，老龄化率可以从43.3%降低为41.8%。看上去幅度不大，其实却把老龄化进程延缓了15年。而且，如果生育率可以进一步向替代水平（即子女数可以替代父母人数，可以在长期中保持人口不增不减，一般为2.1）靠近，这

个效果则更为明显。

此外，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终究要转

## 热点透析

#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展望

陈昌盛 何建武

**提要**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和趋势。我们据此对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展望作了小幅调整。其中，2015年经济增长预测由7.3%下调到7%，未来十年平均增速由6.5%下调到6.2%。

展望未来十年，从总需求结构看，消费率将继续快速上升，由目前50%左右上升到60%以上；投资率将不断下降至35%左右。从产出结构看，服务业占比将快速提高，由目前的48%左右上升至2024年的60%左右。从供给侧看，技术进步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有望从目前30%左右上升至40%左右。

回顾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在增长中实现转型和在转型中积蓄动力的过渡期。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在新旧增长动力接替进程中总体延续下行态势，供给与需求条件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意味着今后一段时期，一系列发展战略、政策都将围绕新常态而制定。除了这一重大变化，从内外部环境以及具体政策的变化来看，以下几个方面将会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和结构转型产生较大影响。

一是中国以PPP衡量的GDP已经超过美国。根据IMF公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按照现价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测算的GDP已经超过美国，相当于美国GDP的101.2%。无论是采用PPP方法折算，还是直接采用现价美元汇率，单独的比较都存在一定缺陷。但这些比较和报道折射出，无论中国是否真实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远超以前。也正是如此，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发展空间拓展的难度也将前所未有；大国逐渐成为中国难以回避的身份特征，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将被期许承担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责任。

二是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与其背后隐含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此轮油价大幅下跌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未来走势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传统的石油出口国可能面临国际收支和财政收入滑坡的双重挑战，货币贬值压力大，并有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石油净进口国而言，油价下跌总体上利大于弊。一方面，贸易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能源价格和税收改革迎来窗口期；另一方面面对新能源发展和资源型地区的发展会造成一定冲击。另外，此轮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长期因素，即新旧技术碰撞，也就是以沙特为首的传统原油开采技术，与以美国为首的页岩油等新开采技术背后的利益冲突。应该说这只是近些年正

大发展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发展空间拓展的难度也将前所未有；大国逐渐成为中国难以回避的身份特征，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将被期许承担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责任。

三是人口政策调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新时期我国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虽然“单独两孩”政策本身对未

来十年影响低于预期，但这一政策的出台却预示着我国生育政策新的调整方向和全社会对于人口问题的重新认识，这可能才

是真正影响未来人口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是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前面提到的人口政策调整也属于改革的一项内容。2014年可以称为新时期的改革元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年共确定的80项重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另外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项改革任务。这些改革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司法、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既有利于提高市场经济的配置效率，也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秩序，还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例如，工商登记制度的改革放宽了市场准入条件，将“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将12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充分激发了市场的活力。2014年1至11月，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158.6万户。其中，3至11月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286.62万户，增长53.99%，注册资本(金)增长92.61%，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企业1.04万户。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每一轮经济繁荣都或多或少地与改革的推进相关。可以预期，目前这些已经实施和将要实施的各项改革，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潜力的又一重要因素。

基于前面介绍的数据和参数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利用模型对未来十年进行模拟，同时结合未来汇率和物价的分析设定，得到了未来十年主要经济指标的展望结果。

一、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处于经济增速转换阶段。与去年的预期一致，2015至2024年将继续处于经济增速转换的阶段，十年平均增速预期将达到6.2%。这一增速略低于去年的预期。增速下调主要源自于我们对近两年增速调整。到2024年人均GDP将由目前的接近5万人民币左右上升至12万元左右，按现价美元折算，大致从7500美元左右上升至2.2万美元左右，按购买力平价折算(1990年G-K国际元)则从1万国际元左右上升至1.7万国际元左右。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届时将与韩国本世纪初以及日本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相当。

二、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将不断调整。分析结果显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将不断调整。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消费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十年消费率将继续快速上升，将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4年的60%以上，相应投资率将不断下滑，到2024年将下滑至37%左右。二是服务业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十年服务业占比将快速提高，由目前的48%左右上升至2024年的60%左右，相应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三是技术进步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与过去相比未来十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将有所下滑，但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高，将由过去平均30%左右上升至2024年40%左右。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增长动力转变的关键是如何更大程度促进科技创新和提升技术效率。随着中国与前沿国家的不断逼近，技术模仿和追赶的空间越来越小，未来前沿创新的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大；随着大的结构调整的空间缩小，未来配置效率的提升，将越来越依靠区域内部、部门内部和行业内部的配置结构改善。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本版编辑 裴珍珍